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专版

发展人民民主的历史性贡献

——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

张磊

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把实现人民民主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为此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历史的进程表明,无论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还是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从来都没有停止过对人民民主的追求。中国共产党团结领导全国各族人民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推翻了人压迫人的旧制度,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政权,在中国第一次实现了真正的人民民主;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运用于中国实际,团结领导全国各族人民确立了以人民民主为内容的基本政治制度,进行了广泛深入的人民民主实践,使中国人民的政治地位发生了根本变化,为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和经济社会的繁荣发展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

尽管我国的人民民主发展也有过曲折,目前人民民主无论是制度上还是在实践中都与既定的目标存在差距,但是,我们找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形成了与西方资本主义民主根本不同的政治模式,人民民主取得了具有深远影响的历史进步。

1. 中国共产党使人民民主意识在中国人民中空前广泛的普及和深入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国人民长期受封建专制思想压迫,民主意识十分淡薄。近代以来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对广大劳动人民在精神上文化上的控制和压迫,进一步扼杀了广大民众的民主意识。是中国共产党开展了空前广泛的民众动员和民主教育,从大革命时期的“从前是牛马,如今要做人”,到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打土豪、分田地”,到抗战时期的“抗日救亡”、“反对奴化”,再到解放战争时期“耕者有其田”“保卫胜利果实”“翻身解放、当家作主”等教育,使反压迫、求解放、要自由的思想得到广泛传播。新中国的建立,不仅使中国人民获得了人身的自由和解放,而且获得了精神上的大解放。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当好人民的勤务员成为社会新风尚;国家主席和淘粪工人只是工作岗位不同,没有地位高下之分的新型人际关系;平等、公平意识和社会正义观念广泛普及,使民主意识深入人心。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大力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大力开展民主法治教育,使以人为本、公平正义、民主平等、个人自由、人权保障以及财产权、隐私权、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的意识广泛普及,并成为人们维护自己权利的武器。在当代中国,民主观念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任何力量想要取消或改变已经大大地提高了的中国人民的民主意识是根本不可能的。这是新中国文明进步的重要体现。

2. 中国共产党使人民民主得到了有力可靠的政治保障

尽管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成功地推翻了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为中国的进步打开了闸门。但是,辛亥革命以后,从袁世凯到各个军阀无不是封建专制制度的维护者。国民党取得全国政权后,并没有实现它所标榜的资产阶级民主,而是大搞封建法西斯独裁统治和特务政治。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表明,人民的民主权利必须有可靠的政治保障。不推翻反动政府的统治,不建立人民的政权,就不可能实现人民民主。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开展了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使千百年来处于社会底层的工农大众,在政治上翻

3. 中国共产党使人民民主在中国社会具有了坚实巩固的经济基础

马克思主义认为,民主作为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同经济基础相适应。马克思指出:“权利决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还指出:体现资产阶级民主的“现代的国家政权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共同事务的委员会”。人民民主作为反映最广大人民意愿的新型民主,必须建立在适应这一新型民主的经济基础上。近代以来,中国的经济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外国资本、官僚资本控制了中国经济的命脉,封建地主经济统治着广大农村。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受到外国资本、官僚资本和封建势力的严重制约。这种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是专制独裁政治制度的经济基础,是广大人民政治上没有地位、人身上没有保障的重要原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给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经济沉重打击,建立起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为人民民主的实现和发展准备了重要前提。建立在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基础之上的人民民主,就从根本上决定了它不受资本的操纵,不是少数人的民主,而是真正的人民民主。在当代中国,人们的富裕程度虽然存在差别,但这并没有成为人们平等地行使民主权利的障碍,这是因为中国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国有经济掌握着国家经济命脉,任何人都不能允许用金钱来左右、干涉人们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

4. 中国共产党使人民民主政治原则转变为国家的基本制度

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

同中国的具体国情结合起来,在长期实践的基础上,建立和逐步完善了体现人民民主原则的国家基本政治制度。在国体上,坚持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既在人民内部实行最广泛的民主,又依法对极少数敌人实行最有效的专政,保证了社会主义国家政权性质。在政体上,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一根本政治制度,保证了人民当家作主的主体地位,是人民掌握国家权力的根本途径和最高实现形式。在政党制度上,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把共产党领导、多党派合作,共产党执政、多党派参政有机结合起来。在国家体制和民族关系上,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保证少数民族依法自主地管理本民族事务,实现了各民族政治上完全平等。在基层民主上,实行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建立起以农村村民委员会、城市居民委员会和企业职工代表大会等为主要内容的基层民主自治体系,保证人民群众自主管理基层公共事务。这一系列政治制度,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既体现了人民民主的真实性,又体现了人民民主的有效性,实现了民主的内容与形式的有机统一,使人民民主有了可靠制度保障。

5. 中国共产党使人民民主在实际生活中得以充分实现

民主作为人类长期追求的一种政治理想,其本意是要求实行多数人的统治。而要真正实现多数人的统治,仅仅有政治上的权利是远远不够的,还要实现人民经济权利和社会权利上的平等或民主。中国共产党始终追求广泛全面的人民民主,在长期奋斗中,不仅领导人民努力争取政治权利,而且努力实现和发展人民在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方面的民主权利。邓小平同志强调,要逐步实现“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经济管理的民主化、整个社会生活的民主化。”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只有在生产活动和社会生活中实现权利,其政治上的民主权利才有坚实的基础。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政治生活中的民主化、经济管理中的民主化和社会生活中的民主化逐步得到落实,人民依法享有各种政治权利和人身自由,人民对国家事务、经济事务的民主参与、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权更加广泛,人民享有

的工作权、休息权、就业、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各项社会权利得到越来越有效的保障,从而使人民民主权利逐步落实到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等各个领域。

6. 中国共产党使人民民主在国家管理和社会管理中发挥着有效的作用

人民民主不仅要体现为国家的政治制度,而且要体现为科学的政治运行模式。中国共产党把人民民主原则运用于国家和社会管理之中,实现了民主与集中的有机统一。国家权力的运行采用民主机制,在制定法律和做出决策的过程中,都要经过广泛讨论,广泛听取人民群众、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和各阶层人士的意见,充分体现人民的呼声和意愿。同时,国家权力的行使又贯彻集中的要求,国家一切权力集中于人民代表大会机关,人民通过这个机关来行使国家权力。在这种运行机制下,人民代表大会作为国家权力机关统一行使国家权力,国家行政机构、审判机构、检察机关虽然分工不同、职责不同,但都由人大产生、对人大负责。这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三权分立、相互掣肘是根本不同的。民主集中制体现和保证了人民当家作主。国家机构的权力由人民赋予、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同时,在国家权力的运用上又实行有效的集中,以保证国家机关协调高效运转,有利于发挥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提高效率办成事的政治优势。由此既体现了人民权力的至上性,又保证了人民权力的统一性。从实践来看,无论是应对四川汶川特大地震、青海玉树地震等自然灾害,还是成功举办北京奥运会、残奥会和上海世博会,成功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都充分体现了我国政府权力运行的协调高效,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的优越性。

实现和发展人民民主,这是20世纪前期,面对灾难深重的旧中国,中国共产党的庄严承诺;当历史进入21世纪,中国已经成为一个繁荣强大、充满生机活力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仍然是中国共产党不变的庄严承诺。这表明,人民民主是中国共产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必将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的历史进程中不断向前迈进。

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国家行政学院 许耀桐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着眼于新的形势,把全面从严治党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标志着党的建设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全面从严治党,赋予了党的建设新阶段以新的内涵、新的特点和新的任务。

全面从严治党丰富了党的建设新内涵

根据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的讲话,新形势下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包含了8个基本要求,即:落实从严治党责任、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结合、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坚持从严管理干部、持续深入改进作风、严明党的纪律、发挥人民监督作用、深入把握从严治党规律。这8个基本要求,构成了全面从严治党的具体规定,从而丰富了党的建设的理论和实践内涵。

全面从严治党展示了党的建设新特点

全面从严治党以高屋建瓴的理论视野,深化了我们对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认识,展现了全覆盖、一体化、全过程、长时期,高标准、严要求,强落实、重成效的4大新特点。

第一,全覆盖、一体化。中国共产党的各级组织,没有任何特殊和例外,都要贯彻实施全面从严治党,实现全覆盖。全覆盖是与一体化联系在一起的。党的十八大报告对党的建设做出了重要部署,即:全面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反腐倡廉建设、制度建设。全面从严治党,必须从这5个方面进一步加强,实现“五个建设”的一体化,不能只重视某一个建设方面而忽视其他建设方面,

更不能只强调某一建设方面而舍弃其他建设方面。

第二,全过程、长周期。全面从严治党的每一项工作,都要重细节、重过程,必须防止半途而废。全过程要求全面从严治党的一每一项工作,一定要善始善终,不图形式,不走过场。同时,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将是长周期、无止境的,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

第三,高标准、严要求。标准决定质量,有什么样的标准就有什么样的质量,只有高标准才能保证高质量。全面从严治党的高标准不是一句空话,不能停留在一些原则性的大体规定上。标准既然是用来衡量的,就一定要把它具体化、条理化、可操作化。有了高标准之后,还需要严要求。严要求,就是规范性的约束务必达到、做到。严要求,是达到高标准的重要途径。

第四,强落实、重成效。一分部署,九分落实。九分落实就是要强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要有一股韧劲,真抓实干,抓铁有痕、踏石留印。全面从严治党强调落实,真抓实干,是为了务求实效。全面从严治党是否有了业绩、取得成效,归根到底也是检验全面从严治党是否可行、是否成功的标尺。全面从严治党是对全行、全社会的衡量,也是判断真落实还是假落实的依据。

全面从严治党肩负着党的建设新任务

全面从严治党在继承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肩负着党的全面建设的六项新任务。

一是全面从严治进行思想教育。只有从思想上建设党,加强党的思想理论和党性教育,才能保持共产党的先进性、高尚

性和纯洁性。思想建党所要解决的是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个“总开关”问题,这是党的建设总任务中的一个根本问题。中国共产党并不是生活在世外桃源、真空净土里,而是生活在现实的各种纷繁复杂的社关系之中。思想建党就是要倡导和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克服和消除各种消极错误的思想观念和行为及其负面影响。

二是全面从严治加强组织建设。我们党不仅是党员个体的总和,更重要的在于党是按照一定的组织原则组织起来的有机整体。民主集中制是党的根本组织制度和领导制度。要健全和认真落实民主集中制的各项具体制度,促使全党同志按照民主集中制办事,促使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带头执行民主集中制。全面从严治加强组织建设,还要建设一支宏大的高素质干部队伍,着力培养、选拔党和人民需要的好干部,夯实基层组织,巩固党执政的组织基础。

三是全面从严治加强作风建设。执政党的党风,关系党的形象,关系党和人民事业的成败。必须在全党大力弘扬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作风,始终谦虚谨慎、艰苦奋斗,以优良党风促政风带民风,形成凝聚党心民心的强大力量。要大兴密切联系群众之风,大兴求真务实之风,大兴艰苦奋斗之风,大兴批评和自我批评之风,以坚强的党性保证党的作风建设。广大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要常修从政之德、常思贪欲之害、常怀律己之心,自觉抵御拜金主义、享乐主

义、极端个人主义等消极腐朽思想文化的侵蚀,真正做到为民、务实、清廉,为在全社会树立社会主义道德新风尚作出表率。

四是全面从严治加强反腐倡廉建设。抓好领导干部的教育、监督和廉洁自律,要从思想道德教育这个基础抓起,进一步深入开展理想信念教育、法律纪律教育、优良传统教育、社会主义荣辱观等廉洁自律教育,不断夯实廉洁从政的思想道德基础、筑牢防腐防变的思想道德防线。要进一步加大惩治腐败工作力度,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方针,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继续抓好大案要案查处工作,切实解决损害群众利益的突出问题,严格要求领导干部廉洁从政,依纪依法严肃查办领导干部滥用权力、谋取私利、贪污贿赂等行为。

五是全面从严治加强制度建设。全面从严治党,制度建设是根本保证。当前,我们党在党的建设制度改革总体规划 and 具体制度的制定方面都取得重大进展,还要继续改革完善一些基础制度和具体制度,如完善干部任用制度、民主监督制度、联系群众制度等;要继续健全完善制度的运行机制,规范行为准则,树立制度观念,强化自律能力,严格制度落实,体现制度成效。

六是全面从严治加强纪律建设。党的坚强有力,源自党的纪律。全面从严治党,就是要加强党的纪律建设。要把纪律建设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坚持纪严于法、纪在法前,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



编者按 适逢中国共产党建党95周年之际,回望波澜壮阔的历史风云,重拾早期革命者留下的大量文献,让我们透过铁马金戈之声,深切感悟党的早期理论家、实干家在战争年代的思想贡献和经济业绩,堪称无声的鞭策。接过前辈手中的接力棒,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重温史话,大有裨益。

20世纪20年代

陈翰笙痛陈旧中国民生困境



简介 著名经济史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顾问。1897年生于江苏无锡,1915年赴国外求学,1924年获德国柏林大学博士学位,到北京大学任教授,1925年由李大钊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从事党的地下工作25年。2004年3月13日在北京逝世,享年108岁。

1928年8月,陈翰笙在《中国农民担负的赋税》一文,开篇这样写道:“十余年来中国丝茶的出口递减,粮食的进口骤增,棉花烟叶的进口逐年超过出口。在此农业破产的趋势中,原料退步,物价腾贵,成本加重,购买力降低,工商业日益萧条,中国将由次殖民地沦落为全殖民地了。所以救国的关键在于解决农业经济各问题。最重要的一个农业经济问题就是赋税,尤其是在只顾人情不讲法律的中国。”

他在文中最后一个部分“勒索与拉夫”又进一步描述道:“当内争时北方战区所有驴马多数必为军队取用,农庄上损失非常重大。因失驴失马而失业者到处皆是。南方很少驴马,行军更须拉夫。南方军队作战时,每一兵须得二人去担任运输、建筑、厨役、洗衣等事。故五万人赴前敌,必拉十万夫役去料理军务。此等夫役照例不给工资。劳力如此虚擄,耕种又因之抛弃,农民的资本愈弄愈少,怎样配讲振兴实业增加生产呢?”

学者笔下旧中国民不聊生、国运衰微的景象跃然纸上。抚今追昔,令人不禁想起几年前习近平总书记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的一段讲话:“历史告诉我们,每个人的前途命运都与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紧密相连。国家好,民族好,大家才会好。”(金平辑)

(史料来源:1928年10月10日《东方杂志》,第二十五卷十九期;1987年11月中国展望出版社《解放前的中国农村》第二辑)

20世纪30年代

毛泽民力推新疆金融改革



简介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行长,中华苏维埃工农民主政府国民经济部部长。1896年4月3日生,湖南湘潭韶山人。1921年秋,在毛泽东创办的湖南自修大学半工半读,同时为党筹集管理经费。同年底加入中国共产党。1942年9月,毛泽民和陈潭秋等共产党员被反动军阀盛世才逮捕。在狱中,毛泽民坚贞不屈,视死如归。1943年9月,被敌人秘密杀害。时年47岁。

1938年2月,受党中央派遣,毛泽民化名周彬,与邓发、陈潭秋等同志在新疆从事统战工作。正值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与新疆军阀盛世才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毛泽民担任新疆财政厅副厅长,主持财政行政工作。

由于连年战乱,加上没有什么财政收支计划,盛世才上台后财政经济越来越困难,只好靠多发纸币来维持开支,印钞机日夜不停地飞转,钞票发得越来越多,导致货币严重贬值,物价以惊人的速度暴涨,人民苦不堪言。毛泽民走马上任之后,通过周密的调查,认为促进经济发展唯一有效的办法,就是进行币制改革,废除新疆原来以“两”为单位的旧银票,统一改用以元为单位的新币。他还决心对原有的省银行进行改革,将官办改组为官商合办的商业银行。与此同时,毛泽民加紧整顿财经纪律,建立严格的收支预算决算制度。他主持制定了新疆第2期“三年建设计划”,并据此制定了全省财政年度收支计划,编制了预算决算表,提出了“发展经济,增加收入,开源节流,保证支出,量入为出,争取收支平衡”的财政工作方针。通过金融、币制改革,新疆财政收支基本平衡了,外债也基本还清了,全疆物价平稳,各族人民的人民生活水平明显提高,工业、农业、商业、文教卫生等各行各业,都开始显露出生机。(金平辑)

(史料来源:2011年4月6日人民网-《人民日报》“双百”人物中的共产党员:毛泽民;2016年6月16日《新疆日报》A10版 张雅平/文)